

# 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王兆峰<sup>1</sup> 谢佳亮<sup>1</sup> 吴卫<sup>1, 21</sup>

(1.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长沙 410081;

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 中国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构建涵盖产业转型、产业运行与产业共享 3 个维度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 借助泰尔指数、重心模型与变系数固定效应回归等方法, 探析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以长沙和湘潭为核心和次核心的“双核”结构, 长沙始终保持领先, 娄底与益阳等则相对滞后。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整体区域差异趋于敛缩,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内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南北差异有所减缓, 东西差距有待优化。③旅游专业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广泛的正向显著影响, 旅游劳动力在发达(欠发达)城市负向(正向)显著, 而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产业结构尚未产生广泛影响。

**【关键词】:**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 创新驱动 产业共享 泰尔指数 变异系数 环长株潭城市群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3-0172-10

环长株潭城市群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囊括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等 8 个城市, 在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具备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在新常态背景下, 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服务业正逐渐成为“稳就业”和“调结构”的重要抓手<sup>[1]</sup>, 在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sup>[2-3]</sup>。然而, 以往粗放型发展所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日趋严重, 已成为制约新时代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指出, 应完善综合效益高、带动能力强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 努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因此, 将旅游产业纳入高质量分析框架, 系统诠释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进而科学把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 对在新时代下实现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 旅游业发展质量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焦点。近年来, 学界多围绕经济繁荣角度探讨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及其影响, 呈现出两种研究趋向: ①效率评价趋向<sup>[4-5]</sup>。多数学者基于投入产出角度将旅游业发展质量理解为旅游效率, 综合运用传统 DEA<sup>[6]</sup>、Super-SBM<sup>[7]</sup>、DEA-MI<sup>[8]</sup>、Tobit<sup>[7]</sup> 及固定效应面板回归<sup>[8]</sup> 等研究方法量化分析省域<sup>[6-8]</sup>、市域<sup>[9]</sup> 等不同研究靶向旅游产业发展的效率水平<sup>[9]</sup>、演化特征<sup>[6]</sup> 及影响因素<sup>[10-11]</sup>。②规模评析趋向<sup>[12]</sup>。部分学者认为旅游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771162); 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 (5010002)

**作者简介:** 王兆峰 (1965—), 男, 湖南桑植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E-mail: jdwzf@126.com

谢佳亮 (1998—), 男, 湖南衡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区域旅游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E-mail: xiejiali2020@qq.com

业发展质量既包括旅游产业自身的经济平稳持续增长、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优化，又涵盖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sup>[13-14]</sup>，是旅游与社会、经济及环境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综合反映<sup>[15]</sup>。随着有关旅游业发展质量研究的持续推进，内容日臻丰富，已由旅游业发展质量内涵的定性讨论逐步向量化评价<sup>[16]</sup>、时空演化<sup>[17-18]</sup>、影响因素<sup>[19-20]</sup>及优化路径<sup>[21-22]</sup>等实证方面不断深化与扩展，研究视角呈现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领域交互的复杂特点；研究尺度既涵盖旅游产品<sup>[23]</sup>、旅游企业<sup>[24-25]</sup>等微观层面，又涉及市域<sup>[20]</sup>、省域<sup>[21-22]</sup>等宏观层面，而如何结合经济地理学视角对不同尺度的旅游业发展质量进行尺度关联或是未来的重要研究趋向。

梳理文献发现，现有关于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有亟待扩展之处：一方面，已有研究多站在狭义的效率视角或广义的多维视角剖析旅游业发展质量，但前者并未脱离生产函数的范畴，难以揭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sup>[26]</sup>；后者虽克服了狭义视角的局限，但已有基于多维视角的研究成果多围绕旧常态下的发展理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缺乏新常态下新发展理念的有效结合，无法映射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多基于全局视角探讨旅游业发展质量的驱动因子，忽略了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所得结论与建议存在着局限。鉴于此，本文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构建涵盖产业转型、产业运行和产业共享3个维度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面板熵值法、变异系数、 $\sigma$ 系数、泰尔指数、重心模型及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辨析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希冀为实现旅游产业繁荣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1 研究方法

#### 1.1.1 面板熵值法

为有效规避主观赋权法所引致的误差，本文借鉴面板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进而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法进行测度。主要步骤为：①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的量纲差异；②依据标准化值来确定指标比重，并计算指标熵值和效应值，继而得到指标权重；③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法测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具体公式参见相关文献<sup>[27]</sup>。

#### 1.1.2 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与 $\sigma$ 系数

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与 $\sigma$ 系数可分别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程度与绝对差异程度，值越大，相对（绝对）差异越大。本文采用上述方法剖析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具体公式参见相关文献<sup>[28]</sup>。

#### 1.1.3 泰尔指数分解

为进一步剖析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演化的内在动因，引入泰尔指数的分解法，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公式如下<sup>[29]</sup>：

$$\begin{aligned}
 TL &= T_w + T_v \\
 &= \sum_{i=1}^m \frac{t_i}{T} \sum_{j=1}^n \frac{t_{ij}}{t_i} \ln \left( \frac{t_{ij}/t_i}{1/n_i} \right) + \sum_{i=1}^m \frac{t_i}{T} \ln \left( \frac{t_i/T}{n_i/n} \right) \quad (1)
 \end{aligned}$$

式中： $TW$ 为区域内差异； $TV$ 为区域间差异； $m$ 与 $n$ 分别为区域数和市域数； $t_{ij}$ 为对 $i$ 区域内 $j$ 市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T$ 为整体研究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t_i$ 为区域 $i$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 1.1.4 重心模型

重心模型是基于地理二维视角来刻画空间要素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地理中心时空演化规律的有效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研究对象的区域均衡性。本文借助重心模型用以厘清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动态演化特征。公式如下<sup>[30]</sup>：

$$X = \frac{\sum_{i=1}^n T_i X_i}{\sum_{i=1}^n T_i}, Y = \frac{\sum_{i=1}^n T_i Y_i}{\sum_{i=1}^n T_i} \quad (2)$$

$$D_{mn} = C \sqrt{(X_m - X_n)^2 + (Y_m - Y_n)^2} \quad (3)$$

式中：(X, Y) 为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心坐标；(X<sub>i</sub>, Y<sub>i</sub>) 为市域地理重心坐标；T<sub>i</sub> 为第 i 个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D<sub>m, n</sub> 为第 m 年到 n 年的重心偏移距离；C=111.111km<sup>[30]</sup>。

#### 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4—2019 年《湖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及市州统计年鉴与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指标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获得，少数缺漏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完整。

## 2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2.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

已有关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诠释多围绕经济学角度而展开，聚焦于经济平稳增长、资源配置高效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sup>[13, 21]</sup>，本质上仍滞留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范畴。一方面，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增长数量而言的，仅作为增长速度的补充<sup>[31]</sup>，无法揭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另一方面，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旅游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sup>[26, 32]</sup>，内嵌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sup>[15]</sup>。可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应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入“多维性”与“新发展理念”后实现的全面深化发展。因此，本文通过提炼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效率、稳定”发展要点<sup>[13, 21]</sup>，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sup>[33]</sup>，揭示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多维发展<sup>[15, 34]</sup>，从而解构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点。

①创新驱动。“创新”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往资源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正面临着传统动力衰减和要素竞争优势削弱的双重风险，因而亟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sup>[15]</sup>，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依托技术进步来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②结构优化。“结构”红利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sup>[13]</sup>，既包括产业横向协调发展的合理化，又涵盖纵向深入发展的高级化进程，前者有助于资源要素在产业内部或产业间的有序流动，后者则是凭借技术进步来提升要素综合利用率，共同支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③效率提升。“效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传统粗放式发展忽视资源要素配置问题，导致资源浪费与闲置现象丛生<sup>[32, 34]</sup>。高质量发展则要求旅游业要提质增效，不断促进效率变革，提升旅游业发展要素的综合效益。④增长稳定。“稳定”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旅游经济缺乏“稳定”便无法实现长期发展<sup>[21, 34]</sup>，不能为旅游业高质量跃进提供稳固的经济保障。⑤对外开放。“开放”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助于旅游业摄取全球化红利，引发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集聚，从而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助力<sup>[9, 15]</sup>。⑥区域协调。“协调”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旅游业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制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因而必须重视“协调”新发展理念，弱化区域旅游发展非均衡现象，调动人民主动性与积极性<sup>[34]</sup>，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⑦经济发展。“共享”经济成果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经济发展要求。旅游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注重与经济发展有序协调<sup>[33]</sup>，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⑧社会繁荣。“共享”社会成果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发展要求。社会发展滞后所引致的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可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羁绊<sup>[33]</sup>。因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⑨环境友好。“共享”环境成果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绿色”发展理念，遵循“自然规律”<sup>[15, 33]</sup>，推动旅游业与生态环境有序协调，提升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按“发展动力—发展状况—发展成果”思路<sup>[33, 35]</sup>，将创新驱动与结构优化提炼为产业转型，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与结构动力；将效率提升、增长稳定、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提炼为产业运行，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状况；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与环境友好提炼为产业共享，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发展成果共享。

综上，一方面，针对发展不充分现象，旅游业应致力于产业转型，加速创新驱动与结构优化，保证产业运行“高效、稳定、开放、协调”，实现集约型内涵发展；另一方面，针对发展不平衡问题，应注重旅游业在经济、社会与生态方面的多维成果共享，实现多元化协调发展，继而在上述双轮驱动下助力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进。简而言之，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具备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力基础，呈现高效、稳定、开放和协调的产业运行状况，兼具共享经济、社会与环境多维成果的全面发展（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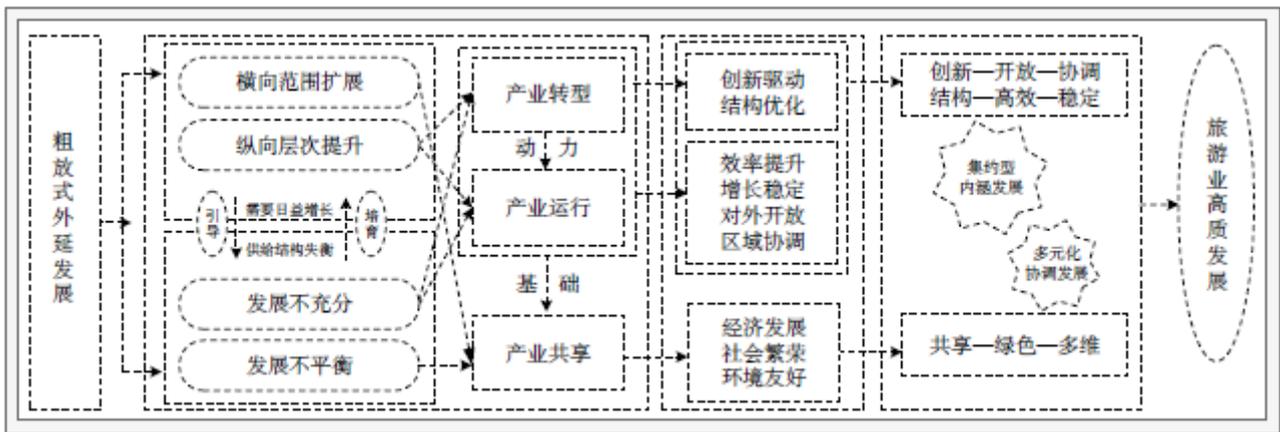


图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框架

## 2.2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充分结合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与高质量发展研究成果<sup>[33-34]</sup>，并考虑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注重效率指标与结构指标<sup>[15]</sup>，构建涵盖产业转型、产业运行和产业共享3个维度的旅游业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2.2.1 产业转型，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动力

①创新驱动：旅游业R&D人员和R&D经费无疑是较为理想的衡量指标，但由于市州统计年鉴均未涉及，因此未考虑在内，而全要素生产率广义上为剥离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后技术因素所引起发展变动的程度，现已在旅游效率研究领域取得较好成效<sup>[8-9]</sup>，因此本文采用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来综合表征创新驱动水平。借助DEA-MI模型测度得到，投入指标<sup>[6-7]</sup>为星级饭店数、A级旅游景区数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产出指标<sup>[8-9]</sup>为旅游业接待总人数和旅游业总收入。②结构优化：由于市州统计年鉴未涉及旅游业部门相关数据，因此采用第三产业替代，尽管具有一定的宽泛性，但也象征了旅游业的综合性。借鉴干春晖等<sup>[36]</sup>的做法，计算第三产业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使用第三产业比重表征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 2.2.2 产业运行，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状况

①效率提升：囿于旅游业从业人员与旅游业固定资产数据的缺乏，使用第三产业数据替代，分别测度旅游资本生产率与旅游劳动生产率<sup>[21]</sup>。②增长稳定：选取旅游经济增长率<sup>[13]</sup>与旅游经济增长率稳定性加以表征，前者为旅游总收入增长占前期比重，后者参考师博<sup>[33]</sup>等的做法，采用3年滚动窗口测度旅游总收入增长率的变异系数的倒数获得。③对外开放<sup>[37]</sup>：使用旅游外汇收入比重与入境旅游人次比重度量。④区域协调：将魏敏等<sup>[34]</sup>的思路应用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中，使用市人均旅游业国内（外汇）收入与全国人均旅游业国内（外汇）收入比重衡量。需要说明的是，选取全国尺度作为参考，原因主要在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助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加之其均为相对指标，亦能反映高质量发展对总量指标的弱化。

### 2.2.3 产业共享，反映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成果

以往旅游业发展质量研究<sup>[14-15]</sup>多将社会、经济或环境系统简单并入旅游业系统，难以体现出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鉴于此，本文借鉴张新成等<sup>[15]</sup>的做法，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判定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协调互动关系，参考相关文献<sup>[6-7, 15, 36]</sup>，甄选如下指标：①旅游业系统<sup>[6-7]</sup>：旅游业总收入、旅游业总接待人次、星级饭店数、A级旅游景区数、旅游业总收入占GDP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②经济系统<sup>[38]</su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③社会系统<sup>[15]</sup>：城镇化率、城镇失业登记人员数、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④环境系统<sup>[15, 38]</su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SO<sub>2</sub>排放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3 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

### 3.1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格局

以2003、2010与2018年为时间截面，借助ArcGIS软件平台，采用自然断裂法对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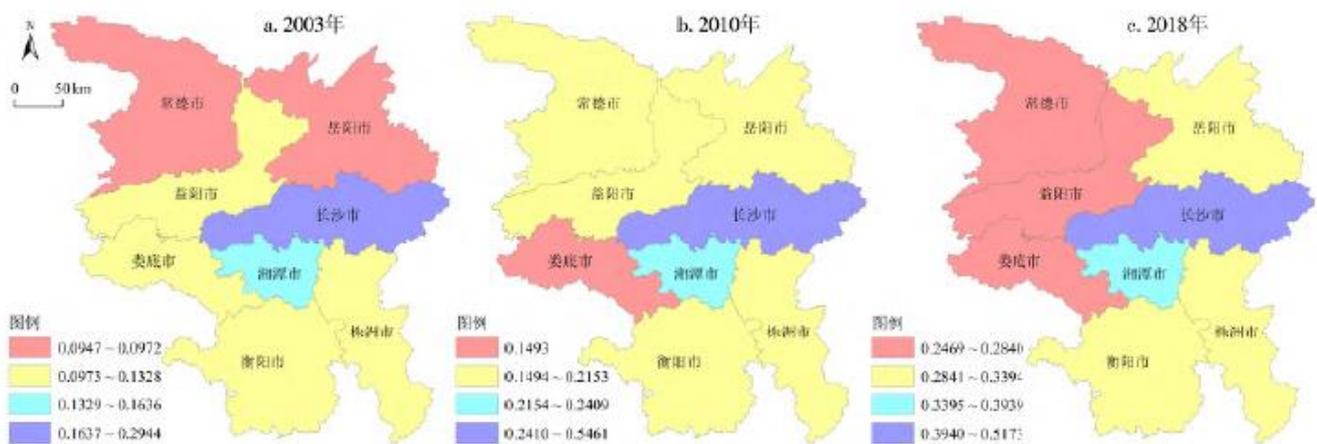


图2 2003—2018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格局

总体而言，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值区在研究期内始终位于区域中部，南北区域差异有所减缓，整体区域非均衡现象也趋于弱化，大致形成以长沙和湘潭为核心和次核心的“双核”空间结构。具体来看，2003年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北部地区低值集聚、中南部地区高值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极化现象明显，其中，高值区为

长沙和湘潭，而常德与岳阳等城市则相对滞后，这可能与不同市域的经济基础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具有密切联系。2010年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南北区域差距明显缩减，城市群内部市域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但长沙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总体呈现出以“长沙核心城市圈”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这可能与“中部崛起战略”区域发展政策红利的渐进性显现具有密切关系，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增强，加之《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14）》的科学践行，长沙作为规划的核心主体，凭借自身所拥有的区位和经济双重优势“虹吸”大量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旅游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因而致使长沙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且处于最高水平。此外，随着“长株潭”一体化程度持续加深，市域间的时空距离不断压缩，长沙作为增长极辐射带动周边邻近地区发展，“扩散效应”和“同城化效应”日益增强，有效促进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和城市间互动响应，进而致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逐渐均衡。到2018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大致形成以长沙和湘潭为核心和次核心并向外扩散的“双核”空间结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表现出效应强弱随经济距离不断衰退的特征，进一步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打破行政壁垒，弱化地市内时空距离或许是较好地传递溢出效应的有效途径。

### 3.2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 3.2.1 区域总体差异

为合理刻画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时序演化图景，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与 $\sigma$ 系数来探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程度与绝对差异程度，并绘制出相应的折线图（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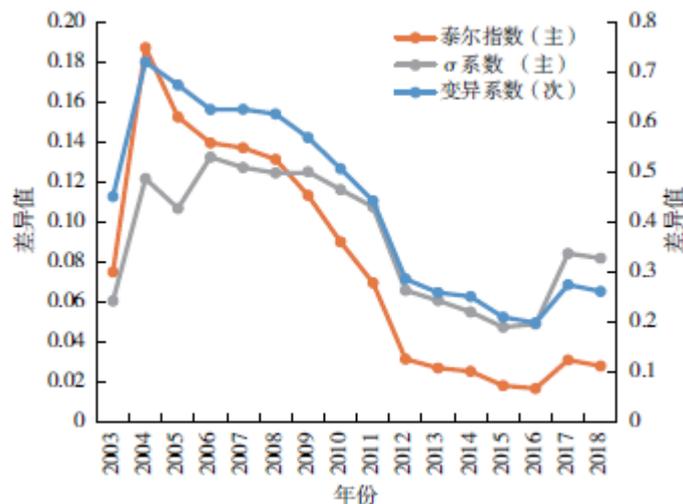


图3 2003—2018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区域差异

从相对差异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总体上均呈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分别由2003年的0.452和0.075下降至2018年的0.261和0.028，年均降速分别为3.6%和6.4%。需要注意的是，变异系数与泰尔指数在2004和2017年这两年中，变化均较为剧烈，这可能与“非典”、旅游圈的划分等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sup>[1]</sup>，因而致使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跃升。从绝对差异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内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不断敛缩， $\sigma$ 系数的演化特征与相对差异相吻合，均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减的演变趋势。此外， $\sigma$ 系数在2004和2017年也呈明显提升态势，与相对差异较为一致。综合来看，研究期内，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态势良好，市域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减，但仍存有改善空间，亟待优化。此外，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发展可能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或许是弱化干扰的有效途径。

### 3.2.2 总体差异分解

前述分析仅能解读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总体演化特征，无法探明区域差异演变的内在动因，因此，为洞察“长株潭都市圈”增长极与周边邻近地区的发展差异特征，将研究区域划分为“长株潭都市圈”与“环都市圈区域”两大区域，前者囊括长沙、株洲及湘潭3市，后者则为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及娄底5市，继而借助泰尔指数分解法辨析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的演变趋势及其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从区域内差异来看，整体而言，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TW仅在2004年有所跃升，总体仍呈明显下降趋势，由2003年的0.035下降到2018年的0.011，年均降速为7.6%。具体来看，“长株潭都市圈”与“环都市圈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TW演化特征均与整体区域内差异相吻合，皆经历了“扩大—缩减”的演变过程，均值分别为0.046和0.011，表明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呈现出“长株潭都市圈>环都市圈区域”的空间分异。与此同时，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仅在2004年跳跃式增长，这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联系；在2005—2012年期间，TV则呈现出先波动下降后断崖式下跌的演化态势，此阶段，环长株潭城市群内各市开始经营和扩展旅游业务，但由于各市域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及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区域间差距在前期改善程度稍显较小，但随着中部崛起战略、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等发展政策成效的显现，各市域在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和交通网络建设等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升，为旅游产业繁荣提供了必要的发展基础，因而地区间差异逐渐趋于敛缩；到2012年以后，地区间差异则维持相对稳固，但仍存有亟待优化的空间。从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来看，考察期内，“长株潭都市圈”与“环都市圈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率达67.5%，而两大区域间的差异贡献度为32.5%，结果说明：环长株潭城市群内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长株潭都市圈”与“环都市圈区域”内部，短期分区发展和内部优化调控或可能是当前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 3.3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心轨迹

前文基于分布差异角度解读出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演化特征，为进一步从动态视角把握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演进趋向，采用重心模型测度得到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心迁移轨迹（图4a），并以北（东）为正方向，南（西）为负方向绘制南北向（东西向）偏移距离的折线图（图4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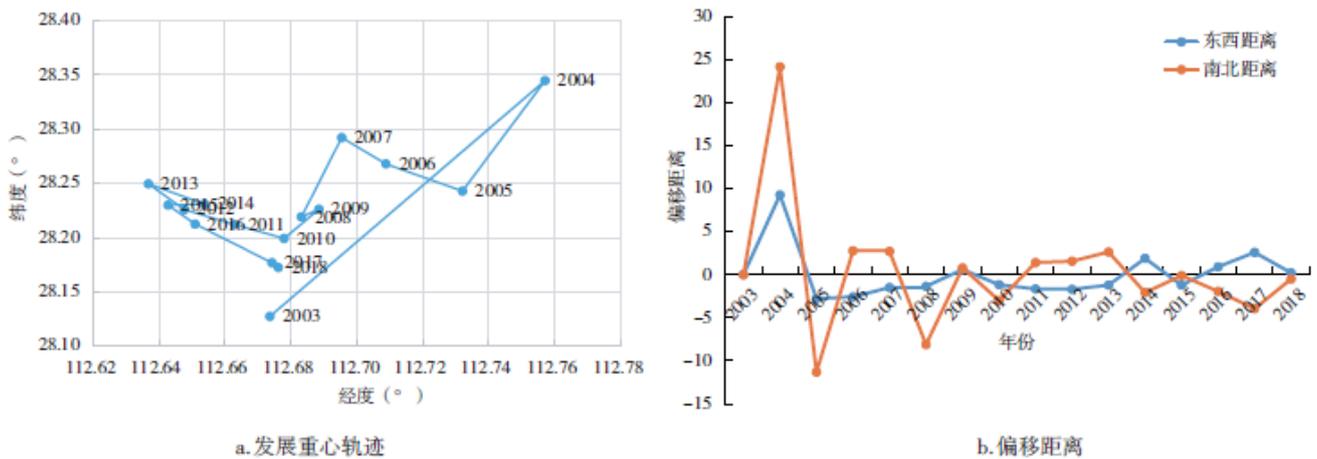


图4 2003—2018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心轨迹

由图4a可知，研究期内，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坐标在112.64°E~112.76°E，28.13°N~28.34°N间波动变化，主要位于长沙境内，说明长沙为城市群内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心所在。从重心演变趋势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的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心在 2003—2004 年呈明显的“东北向迁跃”趋势，偏移距离较远；其后重心表现为“西南向偏移—东南向偏移”的演化轨迹。从重心偏移距离来看（图 4b），南北向迁移在研究期内总体上呈震荡演变趋势，说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重心在南北间交替转移。具体来看，2003—2010 年震荡幅度较大，其后有所缩减，但总体仍向北迁移 4.99km；2003—2010 年东西向迁移特征与南北向迁移相吻合，均呈震荡演化趋势，但在 2010 年后转变为与南北向迁移截然相反的偏移轨迹，总体向东偏移 0.28km。通过比较分析可知，东西偏移距离小于南北偏移距离。结果说明：研究期内，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南北区域差异有所减缓，而东西部差异仍较为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位于长沙西部的城市主要有益阳和娄底，而两者与岳阳、衡阳等市域在经济基础、旅游吸引物等方面仍具有些许差距，或存在无法有效吸引长沙、湘潭等地客源的现象，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长沙旅游产业始终呈利好发展态势，同时辐射带动株洲和常德等城市的发展，因而致使东西差异变化幅度较小，南北差异趋于弱化。

## 4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 4.1 影响因素甄选

由前文分析可知，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TQ）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为深入洞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参考相关文献<sup>[7-9, 13]</sup>，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在规避影响因子共线性的基础上进行指标遴选（VIF 均小于 7.5），具体如下。

经济水平（EL）：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强大的集聚经济优势，促进基础设施完善，同时虹吸大量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旅游技术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引进提供必要的物质财富支持，参考相关文献<sup>[8, 13]</sup>，用城市人均 GDP 表征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专业化（TL）：旅游专业化程度能反映出旅游产业的区域优势，随着旅游产业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旅游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消耗和产业成本有所下降<sup>[7]</sup>，有助于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和提升旅游竞争力，从而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旅游总收入的区位熵加以度量<sup>[9]</sup>。旅游劳动力（LQ）：旅游业作为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产业，优质劳动力有助于提升管理水平和促进旅游技术创新，间接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sup>[8]</sup>，遴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来表征旅游劳动力水平<sup>[8]</sup>。交通条件（TRA）：交通条件的优化有利于压缩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和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从而有效促进市域间互动响应，是区域旅游产业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公路交通为城市群内部互动的主要方式，具有一定的便捷性和普适性，因而采用公路里程来表征交通条件<sup>[7-9]</sup>。产业结构（IS）：产业结构优化能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维持长期动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sup>[8-9]</sup>。

### 4.2 影响因素分析

#### 4.2.1 面板单位根检验

为规避伪回归现象，综合运用 LLC 检验、IPS 检验和 ADF 检验得到各变量平稳性情况。lnEL 和 lnTRA 为平稳序列，lnTQ、lnTL、lnLQ、lnIS 为非平稳序列，继而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进行差分处理，直至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而可知 lnTQ、lnTL、lnLQ、lnIS 均为一阶单整。进而采用 Pedroni 协整检验（Phillips-Perron=-4.0107\*\*\*），可知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进行回归分析。

#### 4.2.2 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为探析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水平、旅游专业化、旅游劳动力、交通条件及产业结构为解释变量，并进行对数转换以弱化异方差干扰，进而借助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面板回归模型涵盖时序、截面与变量三维信息，能有效解决遗漏变量问题。依据系数的不同可分为混合回归、变截距回归与变系数回归 3 种模型，变系数模型有助于揭示驱动因子的个体异质性，成效已在既有研究中得到很好印证<sup>[8-9]</sup>。因而为洞察环长株潭城市群旅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特征，拟采用变系数模型进行估计。同时经 F 检验 ( $F=11.770$ ,  $P=0.000$ ) 与 Hausman 检验 ( $\text{Chi}(5)=49.730$ ,  $P=0.000$ ) 可知，不接受混合效应与随机效应的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因此最终借助面板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①从经济水平来看，经济发展对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来看，仅长沙和岳阳呈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估计系数分别为 0.731 和 0.492，湘潭、衡阳、常德和娄底尽管表现为正向关系，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有待深化；而株洲与益阳则呈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结果说明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未明显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甚至少数城市的旅游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抑制。毋庸置疑，经济发展能为旅游产业繁荣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必要的旅游基础接待设施和更为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但由于旅游业与其他产业存在着经济资源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投入资金捉襟见肘，加之部分城市仍滞留于追求旅游规模经济的初级阶段，致使有限的旅游资金并未有效投入到旅游技术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引进等方面，因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正向积极影响尚不广泛。

②从旅游专业化来看，整体而言，旅游专业化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较为广泛的正向显著影响。具体来看，除常德和娄底分别呈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外，其余城市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系。结果说明旅游产业专业化是影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主要缘于区域旅游产业的专业化发展更容易产生规模效应，有助于减少旅游产品在不同行业和部门间的流动成本，进而推动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产生强盛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因而旅游产业专业化发展程度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产生了广泛的正向显著影响。

③从旅游劳动力来看，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城市中，长沙 ( $-2.158$ ) 和湘潭 ( $-0.302$ ) 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旅游劳动力呈明显负向关系，而益阳 (2.660) 和娄底 (1.406) 则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系。结果说明，旅游劳动力并未有效提升旅游产业较发达的城市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甚至产生了抑制作用，而对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的旅游产业繁荣产生了正向积极影响。原因可能在于，在旅游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的阶段或较为滞后的地区，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完善，旅游业从业人员有所欠缺，因此旅游劳动力规模与数量所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旅游产业发展相对发达的区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具有充足的旅游业从业人员队伍，因而旅游劳动力的数量与规模未能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出现抑制现象。说明未来应更为注重旅游业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实现旅游劳动力的数量向质量的方向性转变。

④从交通条件来看，长沙 (0.821)、株洲 (0.932) 和益阳 (0.343) 的交通条件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其余城市均不显著。结果说明，随着旅游产业的纵深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有所降低。原因可能在于，交通作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在旅游产业发展初期所产生的作用较为明显，而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与城市交通可达性的不断提升，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其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已无法像旅游专业化等集成因素一样提供广泛显著助力<sup>[9]</sup>，加之交通综合网络建设可能与旅游交通网络构建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从而致使交通条件尚未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更为有效和广泛的正向积极影响。促进交通综合网络与旅游交通的有序衔接或许是破除当前发展困境的有效举措。

⑤从产业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仅对株洲、湘潭和益阳 3 个城市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均不显著。结果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对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稍显薄弱，亟需深化。原因可能在于，由于目前环长株潭城市群内各市域的旅游产业发展多依赖于门票经济<sup>[9]</sup>，无法与第三产业中的其他产业实现良性互动，加之以往粗放型发展理念尚未完全转变，部分城市仍处于扩大旅游规模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存在亟待优化的空间，因而致使产业结构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的正向影响尚不广泛。

## 5 结论与讨论

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从产业转型、产业运行和产业共享 3 个维度综合测度 2003—2018 年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继而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重心模型及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综合考察旅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论如下：

①从空间格局来看，考察期内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高值区始终稳固在区域中部，南北部区域差异有所减缓，总体形成以长沙和湘潭为核心和次核心的“双核”空间结构。具体来看，长沙由于区位与经济双重优势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而娄底、益阳与衡阳等城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②从区域差异来看，研究期内，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对差异与绝对差异总体上均呈敛缩态势，区域发展非均衡现象有所减缓；从差异分解来看，“长株潭都市圈”与“环都市圈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间差异小于区域内差异，区内差异是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

③从重心轨迹来看，2003—2018年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心坐标始终位于长沙境内，总体呈西北向迁移趋势，其中，南北向偏移距离远大于东西向偏移距离，南北差异有所减缓，而东西差距仍亟待优化。

④从影响因素来看，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受控于多重因素的驱动，且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旅游专业化对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了广泛的正向显著影响，旅游劳动力则呈现旅游产业发达（欠发达）城市负向（正向）显著的特征，而经济水平、交通条件和产业结构尚未产生广泛影响，亟需深化。

由结论可知，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长株潭都市圈”区域，且“长株潭都市圈”内部差异是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来源。因此，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长株潭”协同发展，加速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有效弱化圈内差异，进而在产生集聚经济优势的同时传递涓滴效应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同城化发展。同时，由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可知，应充分把握不同城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要素，寻求驱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合理路径，如：①应积极推动旅游产业专业化发展，以此来产生更为广泛的正向促进作用；②旅游产业较发达城市如长沙，旅游劳动力需求应实现数量向质量的转变，追求高素质旅游人才，而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城市如益阳与娄底，旅游劳动需求短期内追求数量是促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就长期而言，也应逐步向追求高素质旅游人才转变；③应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旅游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不断强化综合交通网络与旅游业的有序衔接，促使旅游业与第三产业内部产业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进而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广泛助力。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时代矛盾变化的客观需要和提升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区别于以往旅游业发展质量的经济视角<sup>[13, 21]</sup>，本文在充分吸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基础上，同时尝试结合新发展理念，力求充分映射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sup>[26]</sup>，按“发展动力—发展状况—发展成果”逻辑构建涵盖产业转型、产业运行与产业共享3个维度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继而借助数理与地理学方法洞察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以期能够系统全面地揭示新时代下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发展路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新发展理念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切入视角，难以涵盖所有视域的观点，因而仍需扩展其他研究视角来丰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此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全新的时代课题，本文在充分吸收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基础上，尽可能使之贴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际，但囿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匮乏与部分数据的限制，仍可能存在局限。上述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延伸方向。

#### 参考文献：

[1]张月友,董启昌,倪敏.服务业发展与“结构性减速”辨析——兼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J].经济动态,2018(2):23-35.

[2]郑群明,姜奎.湖南省旅游经济的地区差异与动态收敛性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29(11):2396-2405.

- 
- [3] 马丽君, 张家凤. 区域旅游发展空间差异变化对经济发展平衡性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20, 40(1):197-203.
- [4] Cuccia T, Guccio C, Rizzo I. The effects of UNESCO World Heritage List inscription on tourism destinations performance in Italian regions[J]. Economic Modelling, 2016, 53(2):494-508.
- [5] Tang R. Trade facilitation promoted the inbound tourism efficiency in Japan[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1, 38(4):100805.
- [6] 方世敏, 黄琰. 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与规模的时空演化及耦合协调[J]. 地理学报, 2020, 75(8):1757-1772.
- [7] 王梓瑛, 王兆峰. 碳排放约束下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1, 30(2):280-289.
- [8] 申鹏鹏, 周年兴, 张允翔, 等.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8, 27(1):53-62.
- [9] 王兆峰, 赵松松. 基于 DEA-Malmquist 模型的湖南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动态演化及影响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9, 28(8):1886-1897.
- [10] Sami C. China's regional tourism efficiency:A two-stage double bootstrap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9, 11(3):183-191.
- [11] Habib A, Hasan K. An institutional appraisa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The case of the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 Cyprus (TRNC) [J]. Tourism Management, 2005, 26(1)79-94.
- [12] 查建平. 低碳经济视角下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11):63-73.
- [13] 刘英基, 韩元军. 要素结构变动、制度环境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J]. 旅游学刊, 2020, 35(3):28-38.
- [14] 刘大均, 谢双玉, 逯付荣. 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空间差异综合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2, 28(8):761-763.
- [15] 张新成, 梁学成, 宋晓, 等.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失配度时空格局及成因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12):201-208.
- [16] 陈秀琼, 黄福才. 中国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定量评价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9):59-63.
- [17] 丰晓旭, 夏杰长. 中国全域旅游发展水平评价及其空间特征[J]. 经济地理, 2018, 38(4):183-192.
- [18] 张爱平, 钟林生, 徐勇, 等. 中国省际旅游发展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J]. 地理科学, 2015, 35(3):283-292.
- [19] 王倩, 赵林, 于伟, 等. 中国旅游经济系统韧性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0, 36(6):113-118.

- 
- [20] 龙祖坤, 李绪茂. 湖南境内武陵山片区旅游产出规模分异、质量与空间结构初探[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8, 27(4): 756-767.
- [21] 刘佳, 王娟, 奚一丹.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化[J]. 经济管理, 2016, 38(8): 160-173.
- [22] 杨勇. 互联网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了吗?——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旅游学刊, 2020, 35(1): 32-46.
- [23] Teresa B, Monika W, Liszewski S.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ourist packages in tunisia by Polish tourists: A case study using the SERVPERF method[J]. Turyzm, 2017, 27(2): 11-21.
- [24] Kim N, Shim C. Social capital, knowledge sharing and innovation of 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a tourism clus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8, 30(6): 2417-2437.
- [25] Alomari B, Awawdeh A, Alolayyan M N, et al. Employee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tourism sector (Case study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employee performance)[J]. Modern Applied Science, 2017, 11(9): 1844-1852.
- [26] 金磊.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 5-18.
- [27] 杨丽, 孙之淳. 基于熵值法的西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评[J]. 经济问题, 2015(3): 115-119.
- [28] 张超, 钟昌标, 蒋天颖, 等.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9): 15-26.
- [29] 吴文智, 赵磊. 中国城市旅游业发展地区差异与空间极化研究[J]. 旅游科学, 2021, 35(1): 23-43.
- [30] 汪晓春, 李江风, 张祚. 海南省旅游重心演变及空间分异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 2018, 27(4): 156-166.
- [31] 温诺·托马斯. 增长的质量[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 [32] 何建民. 新时代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与战略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10): 9-11.
- [33] 师博, 张冰瑶.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19(3): 19-27.
- [34] 魏敏, 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1): 3-20.
- [35] Mlachila M, Tapsoba R, Tapsoba S J A. A Quality of Growth Index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 Proposal[R]. IMF Working Paper, 2014.
- [36]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 46(5): 4-16, 31.
- [37] 喻蕾.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政策意义[J]. 经济地理, 2021, 41(6): 147-153.
- [38] 刘定惠, 杨永春. 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1, 20(7): 892-896.